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原先在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保健工作的顾英奇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二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门诊部的主要任务是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服务;也为警卫处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看病。他回到中南海后,就根据上级指示,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许多年过去了,顾英奇听到了一些关于“刘少奇是因为没有得到妥善医治而去世”的传闻,他觉得这不符合事实,于是就撰写了本文。



文革前,刘少奇(右二)在视察工作 资料图片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的真实经过

中南海门诊部一开张就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就被以“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的罪名打倒(后来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软禁于中南海福祿居。

我们调回中南海后,根据上级指示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我们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那个时候极左盛行,江青一伙又唯恐天下不乱,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但是门诊部的人员还是正确地对待、处理了这个问题。

那时,正是少奇同志遭遇残酷迫害,精神受到巨大摧残之后;他的生活待遇和伙食标准也骤然降低,这一切都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我们出诊时看到,他家门庭冷落,院落荒芜,气氛肃杀,有的房间还有造反派张贴的大字报残迹;他的屋门外有一名游动哨兵,身边还有一位原来的秘书,一位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和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他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系;部队给派来一位年轻的厨师。这些人对他的态度还是和气耐心的。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也都尽职尽责,但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都很少说话,气氛压抑。

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那个庭院和室内。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面色苍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门诊部的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少奇同志都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但风云突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变成了最大的走资派,成了“阶级敌人”。这使我们与他接触时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1968年4月,刘少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地按照医患之

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的轻视和懈怠。当时,他身边的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照领导交代的原则对待他,可以说做到了“公事公办”。

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要千方百计救治刘少奇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睡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他。”我只能说,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执行的是“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这个指示。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卜志强(也是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也是指示要尽力救治。

医护人员七次把刘少奇从凶险的肺炎中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认不出(医学术语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

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都是由于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才得以好转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人员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至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清洁被褥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时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顾英奇/文 摘编自《炎黄春秋》

本文作者陈廉方系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南京大学教授冯端的妻子。20岁时,陈廉方机缘巧合之下,成为杨宪益先生儿子的书法课老师。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但因此结下的缘分却一直让她铭记于心。

冯端院士夫人与翻译家杨宪益一家的不解缘

第一段:北碚路遇散步的杨氏夫妇

被称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我国著名翻译家、诗人、文化史学者杨宪益先生于2009年11月23日巨星陨落,让人不胜唏嘘!我不禁回忆起一些与杨宪益夫妇和他们长子有关的往事。我和我的先生冯端院士与杨先生一家有过三段不解的缘分。

记得1940-1945年,时为抗战时期,我家住在重庆北碚附近的小镇天生桥。那个小镇上只有一家肉铺和几个挑担卖菜的菜农。在靠近北碚的那段公路上,我经常会遇到一对在散步的异国伉俪,他们边走边谈,总是面带微笑。男的穿长衫,女的是外国人,穿的却是布旗袍,十分朴素。因为她是外国人,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因此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刻。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国立编译馆西迁北碚,为了支持丈夫杨宪益回国抗日,年轻的英国女士戴乃迭也来到中国,1943年秋两人来到梁实秋主持的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当时他们的大儿子已经出生了,他叫杨焯,后来和我有一段师生之缘。

第二段:我当上了杨家长子的书法家教

抗战胜利,我随家迁回南京,才知道那时国立编译馆西迁北碚,胜利后又迁回南京,也才知道,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就在国立编译馆工作。

1947年春,20岁的我在中央大学外文系读大二,有一位朋友问我愿不愿意去杨宪益先生家当家教,教他们的儿子写毛笔字。他家住在玄武门百子亭,我想好在离成贤街中央大学不远,每周两次,时间都在下午,我就答应了。

到了约定的日期,我按照介绍人所说的地址及门牌循路找去,见到一座砖木结构的极其普通的小平房,大概只有四五间居室,十分简洁,与当年军政委员、达官贵人在山西路一带建造的风格各异的豪华公馆别墅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敲响门后,一位中年女佣来开门,她说主人不在,我说明了来意后她便把我迎进院子,这时从屋里跑出一个小男孩。那是杨家的长子,金发碧眼,皮肤白口,他会说中文并很有礼貌地叫我老师。接着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一间客厅兼书房的房间,房内陈设也极简朴,书桌上已摆放好笔墨纸砚,小男孩告诉我,他叫杨焯,请我教他写毛笔字。于是我便开始从握笔、笔顺教他,他很听话,认真地学,有时我还手把手教他。

我每周去两次,一次1-2小时,他从不迟到,很讨人喜欢,他还会谈起自己遇到的一些趣事。因为我去的时间都是杨先生夫妇上班的时间,所以每次都见不着他们。

没想到,一天下午我到杨家,却看到杨先生和夫人并坐在沙发上,杨先生手执一封中文信,在用英文讲给夫人听。他的夫人着中

装,十分简单,与我们当年女大学生的服装一样。长仅过膝的旗袍,没有佩戴任何饰品,但光彩照人。这时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就是我在北碚公路上见到的异国伉俪。我感到意外的惊喜,但我没对他们说。他们见到我很客气地起身打招呼,寒暄了几句。两三个月后,我因患了严重的胃病,便辞去了这份家教工作,我没有向他们当面辞行,也没有接受他们的酬金。

杨宪益在南京期间,曾帮助找回流落的四千余件甲骨文。那时,南京刚刚解放,西方国家措手不及,纷纷关闭大使馆。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代办是杨宪益夫妇的朋友,他撤离南京前告诉杨宪益,他在收拾使馆财物时,发现一只旧木柜,内藏纸包的骨片,并刻有文字。认为这是中国文物,不能带出国,就问杨宪益怎么处理。杨宪益去看了这批文物,肯定是殷商甲骨,然后叫了一辆三轮车,送交南京博物院。

文革期间,他们夫妇受到了不公正的批斗,夫妇俩都坐了四年大牢。当时他们的三个孩子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费,衣食无着,流落在农村。杨宪益出狱时,将一生收藏的200多件书画文物,无偿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文革后,听说他们的长子因受父牵连而精神失常,后来送到他美国姨母家治疗,最终引火自焚,我感到十分震惊与惋惜!今天行文至此,他儿时可爱的模样又浮现在我眼前。

第三段:丈夫冯端意外的书缘

我的丈夫冯端任教于南京大学物理系,他的专业是凝聚态物理,但他在文、史、哲乃至艺术方面涉猎甚广。解放初期,他从南京旧书肆里购得一本Gerard Manly Hopkins(1844-1898年)的诗集,扉页上有原书主人的签名,当时他并未在意,书购回后经仔细辨认发现是Gladys B. Taylor的名字, Taylor是杨宪益夫人戴乃迭娘家的姓氏,所以可以证明是戴乃迭婚前在英国所购,但不知缘何流入南京旧书肆。此书现仍在冯端的书架上,但由于藏书众多,一时未能寻获。

得知杨宪益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和丈夫不禁感慨,在经历过许多坎坷后,他在自传中译本《漏船载酒忆当年》中只字未提曾经经历过的不可想象的悲痛,仍安静地坐下来翻译了那么多的诗集名著。他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范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红楼梦》三卷本,是至今为止唯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他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上一个百年树了杨宪益先生这样的真才、奇才,许多人无不感慨地说:“在新时代培养的才俊中,还有没有像他们一样光耀未来的星斗?”

陈廉方/文



陈廉方和丈夫冯端院士
快报记者
施向辉摄